

当代中国外交
CONTEMPORARY CHINA: DIPLOMACY

香港孔子學院
文化保育研究所
榮譽講師 蔡雲芳 敬贈

当代中国出版社
香港祖国出版社



当代中国外交

CONTEMPORARY CHINA: DIPLOMACY

当代中国出版社
香港祖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外交/《当代中国外交》编辑委员会编.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 9
(当代中国丛书：海外版)
ISBN 978-7-80170-845-8
ISBN 978-988-17673-0-1

I. 当… II. 当… III. 外交史—中国—1949~1986
IV. 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6477 号

责任编辑 刘品德 于武真(特邀) 齐治家(特邀) 刘鲁风
责任校对 李建 王小芸 郭雪 姜楷杰 周浩
装帧设计 古手
出 版 当代中国出版社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香港祖国出版社
(香港上环德辅道中 199 号维德广场 19 楼 1906 室)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0.25 印张 40 插页 41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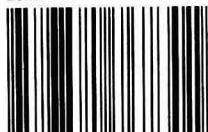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ISBN 978-7-80170-845-8



9 787801 708458 >

ISBN 978-988-17673-0-1



9 789881 767301 >

**《当代中国》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编 邓力群 马 洪 武 衡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伟志 于光远 王忍之 王惠德 朱穆之 华 楠
杜润生 杨白冰 谷 羽 张友渔 周 扬 周克玉
林涧青 房维中 胡 绳 贺敬之 袁宝华 梅 益
薛暮桥

**《当代中国》丛书
编辑部**

(按姓氏笔画排列)

刘 果 杜 敬 杨福云 吴家珣 陈伯林 张 定

《当代中国外交》 编辑委员会

主编 韩念龙

副主编 钱其琛 郑为之 周南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幼平 王炳南 王珍 王进 王倬如 甘野陶
申健 刘春 仲曦东 毕季龙 何英 余湛
陈楚 李汇川 李连庆 陈叔亮 陈应 邵天任
杨公素 郑为之 郑森禹 林平 周南 周秋野
张海峰 张映吾 张明养 柯柏年 宫达非 姚广
郝德青 俞沛文 徐以新 徐英 钱其琛 钱端升
秦加林 宦乡 符浩 章文晋 韩念龙 韩叙
谢益显 程之平 赖亚力 裴默农

《当代中国外交》

撰写、编辑部

主任 薛谋洪 裴坚章

副主任 史 锐 孙 杭

撰写、编辑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卫国 尤颂熙 史 锐 孙 杭 李 樵 李达南

邱 静 宋大巧 张光祐 周溢潢 周万里 荣 植

黄 过 裴坚章 薛谋洪

总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屹立于世，已经整整三十个春秋。

当此之际，我们决定把三十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分门别类，加以总结，编纂成书，陆续付梓，以献给这一伟大事业的创业者和建设者，献给行将参加到这一事业中来的一代又一代新的建设者，献给全国各族同胞和世界上一切关心我们事业的朋友们。

在中华民族四千多年的文明史上，我们当代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最辉煌的篇章。这个时期，中国大地上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各项事业的兴旺，人民的团结，都是空前的。我们并不满足于既有的初步成就，并不想以此矜夸于人，但是我国人民通过三十多年的实践，确实重新建立了充分的民族自信。实践本身向全世界宣告，有着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恢复了和勃发着青春的活力，她完全有能力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扎扎实实，以比较高的速度，迎头赶上，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创业史。其所以艰苦卓绝，一则由于我们的基础太差，起点太低；二则是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如何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造和建设成为一

个富强先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不仅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中是前无古人的创新之举，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无成例可援。我们固然可以参考和借鉴别人的经验，但从根本上来说，却只有靠我们自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独立地认识和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以无畏的革命创造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找出一条中国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这样，振兴中华的大业才会事半功倍，卓有成效。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是否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决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成败的关键。建国以来的历史实践表明，这同样是决定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为此贡献了智慧，付出了劳动，备尝了失误的苦痛和成功的欢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制订和完善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有许多新的创造，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一九八二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又是我们的认识不断提高和深化的过程，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又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沿着这条道路前进，通过全体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脚踏实地的艰苦奋斗，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指日可待的。

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还在发展。我们有责任把我国走过的道路和取得

的经验，介绍给全国各族人民，介绍给世界人民。我国人民必能从中吸取到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可贵教益，国外一切关心中国的人也能够由此增进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了解。这就是我们编撰出版这套《当代中国》丛书的主要目的。

《当代中国》丛书，将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不虚美，不掩过，用可靠的事实资料，如实地写出新中国三十多年的建设史，为世人为后代留下一部科学的信史。我们深信，只要把三十多年建设的成功和挫折的经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一加以科学的总结，那就会使之成为传诸后世的国宝。

当然，任何珍贵的历史经验，都不应变成妨碍人们继续前进的沉重负担。我们不仅不能重复过去的错误，也不能为成功的经验所束缚，而故步自封。历史经验的可贵，在于提供给人们继续前进的力量，在于给人们研究和解决新问题以智慧。现在，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进行经济改革和技术革命的历史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重大的新课题，显然是不可能从既往的历史经验中找到现成答案的。我们的任务在于，正确运用历史经验，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以便用科学性和革命性紧密结合的革新精神，去迎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高潮。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五月三日

导　　言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纪元，中国外交也展开了新的篇章。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旧中国的历史，是饱受列强欺凌掠夺的历史。清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是屈辱的外交。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日起，就为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反对旧中国的屈辱外交而不懈斗争。

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指出，中国处于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的地位，中国人民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一九二四年初，由中国共产党人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坚决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第一次“国共合作”被国民党右派破坏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举行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以彻底地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压榨之下解放出来为目的。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否认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债”。“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绝不容许驻扎，帝国主义的租界、租借地无条件地收回，帝国主义手中的银行、海关、铁路、航运、矿山、工厂等一律收归国有，在目前可允许外国企业重新订立租借条约，继续生产，但必须遵守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



当时革命根据地还很小、很分散，只是“星星之火”，但红色政权制定的外交政策，同国民党政府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坚持积极抗战，组成最广泛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主张“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①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内战。中国人民再一次被迫拿起武器，进行伟大的解放战争。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反对美国侵略和干涉的严正立场，对美国在“调处”国共内战的掩护下扶蒋反共的行径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明确声明：即将在解放战争烈火中诞生的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愿意同它们实行友好合作，愿意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志士仁人一百多年来争取恢复国家独立的夙愿，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在外交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作为分析国际形势、制定对外政策的指南，并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独立自主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它十分珍惜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也大力支持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它坚决捍卫世界和平，真诚希望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在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以及世界各国彼此间，实现和平共处，开展友好合作，求得共同的发展和繁荣。在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不渝地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坚定不移地站在被压迫民族和被侵略国家一

^① 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第343页。

边，站在国际正义和人类进步一边。

中国外交的这些基本原则，贯穿在中国历次宪法对外交政策的规定中。

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了在建国初期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一九五四年宪法肯定了《共同纲领》的上述规定，向全世界宣布“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一九八二年宪法对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有了更完善的概括，它在序言中说：“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综观三十多年来历次宪法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具有高度的连续性。

随着国际形势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所处地位和国内中心任务的变化，以及外交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中国对外关系的政策也有所变化和发展。例如，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立演变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各地激烈争夺，随着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日益从政治领域深入到经济领域，随着中国把国内工作的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等，中国外交政策也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而做了必要的调整，以求更好地贯彻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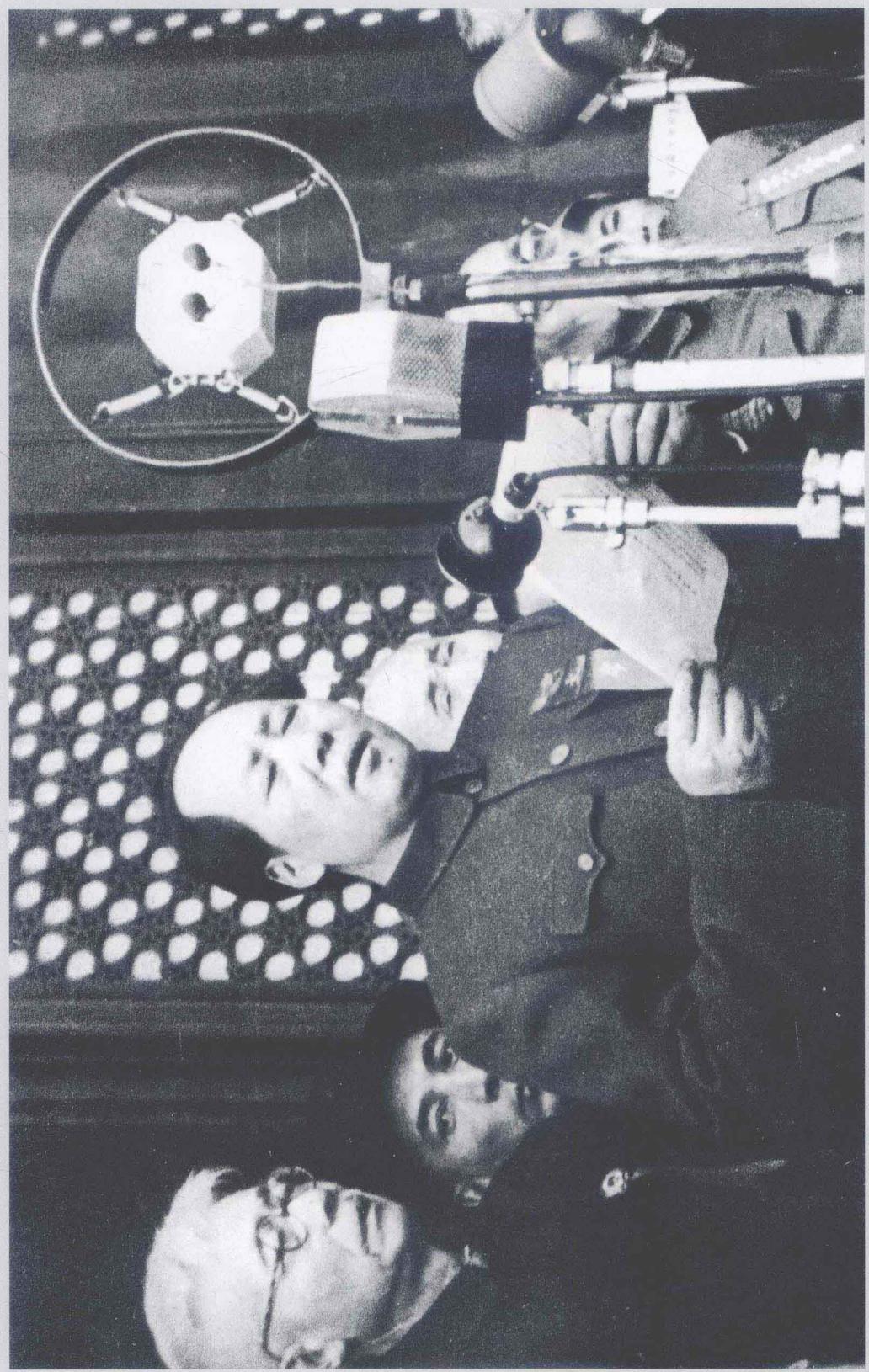
中国外交在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的亲自领导下，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取得了伟大成就。它顶住了超级大国的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它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日益密切、日益广泛的友好合作关系，开展



了经济、贸易、文化往来，为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树立了光辉的范例；它遵循国际主义的原则，对世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世界和平，加速经济发展，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越来越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三十几年间，世界局势动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很难对每一重大国际事件都能及时地做出完全正确的判断，加之国内出现的“左”的错误对外交工作的干扰，新中国的外交难免有过一些失误，值得引以为鉴。但这同取得的伟大成就相比，显然是次要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国更好地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赢得了主动，开创了外交新局面。十亿中国人民正更高地举起独立、和平、平等、发展的旗帜，进一步开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加强同世界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努力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世界的美好未来而继续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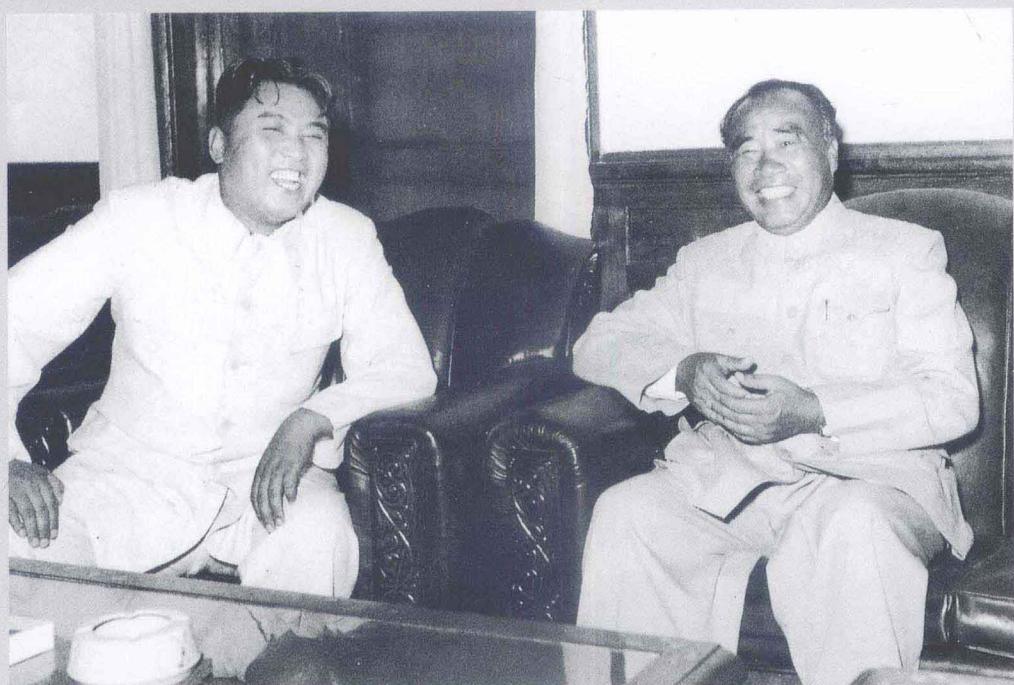


[1] 毛泽东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宣读政府公告



[2] 1950年2月，毛泽东、斯大林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仪式

[3] 1957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举行酒会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4] 1954年9月，毛泽东主席同参加中国国庆庆典的金日成首相亲切握手

[5] 1955年8月，金日成首相同参加朝鲜国庆庆典的朱德副主席亲切交谈



[6] 1955年12月，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访华期间，代表德国艺术科学院授予齐白石通讯院士证书

[7] 1956年1月，朱德副主席在民主德国总统皮克八十寿辰庆典上向皮克总统祝酒

[8] 1956年1月，朱德副主席和聂荣臻副总理参观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矿泉休养所